

穩中求變從「香港營」起步

□崔 寧



議論風生

昨日，在中南海紫光閣，總理溫家寶向梁振英頒發了國務院任命狀。溫家寶還提出兩點期望：要堅持團結香港各界，充分發展，並加強與各界交流，消除分歧矛盾。又引用論語中「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這句話，囑咐為政者要清廉。在此之前，國務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接見香港工聯會代表團時，亦對新特首和未來特區政府提出期望，指出只有大和解、大團結，香港才會贏。

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期盼，對新特首和特區政府的施政以及香港社會各項事業發展，無疑是鼓勵和鞭策。如何跨好第一步，建設「香港營」、推動「大和解」，相信正是接過了「沉甸甸責任」的梁振英「魂牽夢繞」的心事，也是香港社會面臨的重大課題。

所謂「萬事開頭難」。香港情勢目前的關鍵，正如王光亞指出，選舉結束後，大家應本着向前看精神，放下分歧，實行大和解及大團結，共同支持

新一任特首，發展香港經濟，這是香港根本利益。

「大和解」是梁振英在當選後提出的倡議，具體展現在建設「香港營」這項行動之中。這一理念的落實包含三個方面內容：其一，是「任人唯賢」，組建一個能夠落實「適度有為，穩中求變」施政理念，有效率、為社會貢獻智慧和能量的團隊。其二，是積極尋求社會共識，推動共識政治，務求政府的政策措施能夠充分體現民意，顧及各個社會階層利益。其三，是化解社會矛盾，這個矛盾即包括建制派內部的矛盾，也包括政府與「溫和」反對派之間可以調和的矛盾。這是令人期待的目標。要達至這個目標，「香港營」的建設就不可或缺。

實踐「任人唯賢」承諾

「香港營」的建設包含兩個主要內容：一是「梁營」與「唐營」的整合與團結，這是建制派內部的團結；二是政府與「何營」的合作，即爭取反對派中的「溫和」力量，化解對立，逐步建立「共識政治」，締造和諧與理性社會。兩個方面同樣重要，不可或缺。

建制派內部的團結有共同的基礎和信念。這個信念，就是維護「一國兩制」，監督及支持特區政府順利施政，推動香港政制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循

序漸進向前發展，最終達至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的2017年特首由「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和2020年立法會議員全部由民選產生的目標。

梁振英在當選後已表明，未來的執政團隊將會「廣納賢才」，展示了「大和解」誠意和熱情。近來，梁振英馬不停蹄地拜訪金融、工商、法律和專業界人士，向公開表明支持唐英年的政壇元老諸嘉，包括拜訪范徐麗泰、鍾士元等知名人士，並鼓勵公務員士氣。未來特區政府班子亦正在籌建，相信主要官員的組成結構，可以充分展示「大和解」的景象，實踐「任人唯賢」的承諾。

當然，主張「適度有為，穩中求變」的新政府，對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分配，必然會有一些與過往不同的政策，有人將此歸結為「利益的重新分配」。先不論這種提法是否正確，但「變動」是必然的。如何對待這種「利益」的變化，必將極大考驗建制派陣營「大和解」的成效。故此，建制派各政黨團體，首先必須以市民大眾的利益為重，以香港整體利益和保持穩定繁榮的大局為重，識大體、顧大局，成為「大和解」的推動力量，成為「香港營」的建設者。

毫無疑問，中央政府對新特首梁振英的肯定，對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制度和過程的肯定，亦充分反應了香港的主流民意。然而，早前反對派發動

「四一」遊行，污蔑未來社會「豺狼當道」，並公開挑戰中央政府權威，悖逆民意，與社會「大和解」的期待分庭抗禮，是不明智的，是違背社會發展趨勢的，因而難以得到香港絕大多數民眾認同。

「大和解」是發展保障

「香港營」的範圍，包括了反對派中「溫和」的力量，尤其是參與此次行政長官選舉的民主黨，梁振英提出「大和解」包括了「何營」。但是，何俊仁對梁振英早前提出善意的「會面」主張，給予了不理智的回應，強調不會「單獨」與梁振英會面，而要與反對派捆绑在一起「見面」。民主黨亦參加了由民陣打頭的「四一」遊行。這些舉動正是錯判了選後的形勢，忽略了主流的民意。對主張「溫和」路線，並試圖與社民連、「人民力量」等割席的民主黨而言，這無疑將會在香港社會轉變時期，失去歷史的契機，故應三思而後行，不要成為「香港營」的局外人。

正如溫家寶總理強調，未來五年是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動民主十分關鍵的時候。「大和解」並非權宜之計，它是香港未來社會發展的保障，對未來政治、經濟、社會都將產生重大影響。社會各界，尤其是建制派政黨團體，應當全力參與「香港營」的建設，支持新特首梁振英的工作。反對派「溫和」力量，亦要審時度勢，成為社會發展的推動力而不是阻力。只有在社會「大和解」的背景下，新特首的「適度有為，穩中求變」才能由一種理念變成現實，推動香港社會的穩定繁榮。「穩中求變」必須從「香港營」開始。

坐「商務艙」顯自律廉正

□希 爾

凡事針對政府及建制派人士的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從沒有一刻停下來報道負面「新聞」，當發現對象沒有黑材可爆之時，便索性將正面事情妖魔化。就以其在本月10日的一些報道為例，候任特首梁振英上京接受任命，他不想浪費納稅人金錢與太太選乘商務客位，而非以往特首所慣用的頭等機位。對於這個善意安排，「蘋果日報」並不欣賞，他們批評梁振英「造騷」；梁振英向隨行記者噓寒問暖，要求拍照時有求必應，「蘋果日報」又指梁振英「沒有放棄任何親民的『洗底』機會」。

對於「蘋果日報」與別不同的報道手法，筆者見怪不怪，只能一笑置之。看來，他們不是別有用心，便是不熟識梁振英。梁振英本身來自基層而非大富大貴之家，只是憑着個人努力闖出一片天地，又何來「洗底」之說？至於「親民」，立心做一個親民特首，梁振英亦能貫徹始終，無論在競選前和競選後亦沒有放棄任何一個接近市民的機會，親民是梁振英的習慣，而非「造騷」。

「造騷」只是偶一為之，表現生硬；習慣卻流於自然，沒有造作。世上沒有人可以整日二十四小時「造騷」，亦沒有人可以偶一為之做出「習慣」動作。對於梁振英的習慣，我們應該表示欣賞。就如他早前向傳媒透露，他隨身慣用的皮製公文袋已用了數十年，因為其質料好，兼且「用開有感情」，所以一直沿用下來。自此，我們看見梁振英，便不難發現哪個外表已顯得有點殘舊，兼且與其裝束有點不般配的公文袋。

從梁振英的這個習慣，我們便應該知道他是一個「說到做到」的人，不熟悉他的人，或會誤以為他「硬頸」、「鐵腕」、「難於妥協」，但當我們嘗試「觀梁於微」、了解他的理念，便會從心底裡加以佩服。連一個殘舊的公文袋也沒有嫌棄，他又怎會介意坐商務客位呢？對於梁振英說坐商務客位是為納稅人慳錢，我們亦可以預計這將會成為他的習慣，做領導人最緊要以身作則、貫徹始終，梁振英正向其未來下屬作出親身示範。

對於梁振英懂得自律，未接任便嘗試替納稅人着想，兼且勤政愛民，身體力行地主動接觸不同界別人士，對此，我們應該表示欣慰，而不應像「蘋果日報」般將一些正面的事妖魔化。不懷好意的人終日疑神疑鬼，就算讓他們賺盡世上所有錢財，其心底裡亦是悲哀的。



共建「香港營」

□陶今朝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日前在北京會見工聯會代表團時，對梁振英當選香港第四任行政長官給予高度評價。他指出，梁的當選反映香港社會對他的肯定、信任、認同與期盼。

誠然，這次特首選舉，其競爭性比起前三屆來，更為緊張與激烈。正像王光亞主任所說，「雖然過程中出現波折和複雜性，但結果是好的，梁振英在第一輪投票中就順利當選。」筆者認為，這有兩層意義：一是梁以689票當選，直接粉碎了某些別有用心者企圖投「白票」，製造「流選」的陰謀；二是符合王光亞主任早前提出的當選特首需愛國愛港、有管治能力以及較高認受性（即民意支持）的三項條件。就這個意義來說，梁振英的勝出，使香港避免了動盪與衝擊，對香港的長治久安顯然是大有好處。

而今，選舉已經結束，激烈的競爭已告一段落，香港理應重回正軌，重新出發。正像王光亞主任所說，「選舉結束後，大家就要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放下分歧，實現大和解大團結，共同支持新特首與新一屆政府治理好香港，這是港人利益所在。」看來，選舉過程中出現的建制派裂痕應盡快彌合，並修補彼此的關係，以大局為重，共同為香港謀福祉。只有這樣，才不辜負中央對香港的期望。對此，工聯會會長鄭耀棠有關香港「輸不起、分裂不起」的肺腑之言，發人深省。

必須指出，大團結、大和解是香港選舉後重拾信心、重新上路的正途。對此，梁振英正在以身作則，身體力行。他一方面連日來落區接觸市民，聆聽意見；另一方面則頻密會晤政商各界及社會團體，其中不少是原來唐營的支持者，顯見其貫徹大團結、大和解的誠意。總之，選舉結束，已經沒有唐營、何營、梁營，只有香港營。但願社會各界齊心一意撐香港，則香港一定贏！

和解顯包容 團結講原則

□周八駿

為了盡可能團結所有應當團結也可以團結的人，就必須講包容。為了鞏固大團結，則必須講原則。以必要而適當的思想交鋒來爭取和鞏固愛國愛港陣營的大團結，本來並不是一件新鮮事。問題是，這些年來，在實際工作中，有人有時疏忽了。



經歷了第四任行政長官十分激烈而複雜的競選之後，愛國愛港陣營面臨恢復和鞏固大團結的重任。因為，這次競選主要是在兩位被視為愛國愛港陣營代表的政治人物之間展開，反對派政治團體派出的候選人只是演了配角。然而，兩位同屬於愛國愛港陣營的政治人物及其競選團隊之間，展開了一場跌宕起伏、決裂式較量。

為什麼兩位同屬於愛國愛港陣營的候選人之間會展開決裂式較量？因為，有一些人實際上是代表外部政治勢力或者是暗藏的「反對派」，在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中與公開的反對派掙扎相應，對梁振英先生不間斷地展開兩面夾攻。

重新使用「愛國愛港陣營」

長期以來，香港的媒體和輿論是習慣以「民主派」或「泛民主派」來標籤打着民主旗號，反對和阻撓香港回歸祖國的政治團體、政治人物。自從2005年12月關於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改革夭折以來，愛國愛港陣營則是以「反對派」來標籤打着民主旗號，企圖變香港特別行政區為獨立政治實體的政治團體、政治人物。而「愛國愛港陣營」這一標籤被所謂「建制派」一詞所偷換。有些人自己不願意被稱為「愛國愛港者」，同時，對應於「建制派」這樣含混的標籤，將「反對派」改稱為「非建制派」。

然而，反對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既然通過選舉躋身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區議會，他們也就成了特區建制一部分，將他們排除在「建制派」之外是不合邏輯的。

另一方面，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證明：所謂「建制派」中隱藏了外部政治勢力的代理人以及反對派的「別動隊」，人數雖不多，危害卻甚大。

所以，是應當摒除「建制派」這一含混的標籤，重新使用「愛國愛港陣營」和「反對派」（或「泛民主派」）來界定香港兩大對立政治陣營的時候了。

必須要有「海納百川」精神

說這一番話，沒有在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後清理所謂「建制派」的意思。「大浪淘沙」，愛國愛港既不分先後，也自有「一國兩制」偉大實踐與時俱進來分辨：誰是堅定的愛國愛港者、誰是愛國愛港陣營暫時的同路人、誰最終將被歷史滾滾向前的洪流所拋棄。

相反，在經歷了空前激烈和複雜的政治鬥爭之後，愛國愛港陣營的中堅力量必須顯示「海納百川」的包容，盡可能團結屬於所謂「建制派」的絕大多數人。

支持唐英年先生競逐第四任行政長官者，絕大多數都是愛國愛港的。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一早表示，兩位屬於愛國愛港陣營的候選人都是中央可以接受的行政長官人選。最終選擇梁振英先生，是因為他的政治理念切合香港正在展開的由「承前」向「啓後」的歷史性轉變。

有人在競選最後關頭的言行使愛國愛港陣營失望，但是，綜觀其一貫立場和言行，宜視為一時失態。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必須向他及其堅定支持者伸出友誼之手。

為了盡可能團結所有應當團結也可以團結的人士，必須講包容。為了鞏固大團結，則必須講原則。

在對待「一國兩制」偉大實踐與時俱進上，且莫說所謂「建制派」內部存在着重大原則對立，有人只會「承前」、視港英時代一切都

是金科玉律；即使在愛國愛港陣營內部，因為不同政治團體、政治人物的背景和經歷不同，也存在着不可忽視的重要分歧。

是認同和接受「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抑或仍舊在政治和觀念上強調香港這一制與國家主體那一制之間的差異？是與時俱進地豐富和完善香港傳統核心價值，抑或死守香港傳統核心價值？這樣的原則性問題，在愛國愛港陣營內部是尚未取得一致的答案的。

自由、人權等是否必須珍視和維護的核心價值？答案應當既肯定又給以補充性說明，亦即：必須把珍視和維護「一國兩制」，也列入香港與時俱進的核心價值。

維護「一國兩制」核心價值

以必要而適當的思想交鋒來爭取和鞏固愛國愛港陣營大團結，本來並不是一件新鮮事。問題是，這些年來，在實際工作中，有人有時疏忽了。

這在頗大程度上，反映愛國愛港陣營內部關於「一國兩制」的經驗總結和理論研究做得不夠。例如，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長官在香港本地選舉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中央理當當然必須對行政長官選舉過程實施全程管理。但是，且莫說反對派視之為中央違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即使在愛國愛港陣營內部也有人持有類似的懷疑。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三十多年前，國家主體為了邁開改革開放偉大新征程，進行了一場深刻的思想革命。而今，「一國兩制」偉大實踐由經濟講「一國」政治仍強調「兩制」差別，向「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轉變，同樣要求愛國愛港陣營自覺開展觀念變革。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博士

未來特首要適度有為

□蘇偉文



香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起飛，現在已是亞洲的國際城市，也是一個環球金融中心。在這些驕人成就背後，香港也自負於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即是政府不會對經濟發展指手畫腳，一切都是由市場來決定。

在理論的層面看，由市場主導經濟是對的，因為政府的角色不是要與民爭利，而香港的文官體系，造就了一批中立和高效的公務員，但這個文官體系的一個特色，就是政府的執行能力很強，可是在長遠政策上，尤其是在規劃式的藍圖制定，香港就顯得不習慣。以積極不干預作為港英經濟發展上的取態，自然是和港英政府體系配合。可是，是否要將積極不干預變成圖騰，凡事一涉及政府投入便是萬惡不赦？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積極不干預」被神化

二戰後，英國實行福利主義，政府在各個經濟範疇都有很多干預，相反在殖民地的香港卻實行積極不干預政策，可見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在當時並不是一個普世價值觀。當時香港既然是殖民地，是借來的空間和時間，總督作為政府的第一把手也是由宗主國委派，他不是以香港為家，所以政府就不會有長遠規劃這概念，積極不干預只是政府對經濟

無為的一個美麗詞句。而且，港英治下還有一個很重要考慮和掣肘，就是政府財政要自負盈虧，不要給宗主國添煩添亂，因為殖民地最好是財政上健全，若是對宗主國有貢獻更少。能做到這一點，殖民地總督也會有政績，有利其仕途發展，而且沒有財政包袱，宗主國的干預也會少一些，對殖民地總督的監控也會少些。若果要做經濟規劃，就意味着要政府投入更多。如上文所述，財政上港英不太寬裕，所以在英治時港英政府選擇了積極不干預經濟政策，是有其施政上的局限，卻不是真的高瞻遠矚看到香港最適合這個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在某個程度上，積極不干預和香港的成功是時勢造英雄。

這個積極不干預的道理一直在廣泛宣揚，一來是政府對經濟不作為的最好說詞，二來客觀上香港也真的經濟發展迅速，積極不干預也就被神話化，在這個經濟神話裡，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都是不對的。

可是，若我們將目光放遠一點，便會發現在亞洲各地，到處閃動政府扶持工商業和經濟發展的影子。像新加坡在工業化初期便是由政府規劃，新加坡並成立主權基金，對具戰略意義的行業大力扶持，新加坡也是在政府支持下搖身一變成爲亞洲經濟強國；日本在二戰後一片頹垣敗瓦，也是由政府主導工業化後成功的；韓國、台灣等經濟體也是在當地政府規劃下在其專長領域上大發異彩，韓國現時的創意產業是政府大力推動的成果，台灣的電子業驕人，政府的政策更是直接有關。而即使號稱重視自由經濟的美國，其政府也有介入經濟，像金融海嘯期間甚至入股企業，可見所謂積極不干預並沒被

各國奉為金科玉律。

對香港來說，現時我們在經濟發展時不時會遇到瓶頸，政府官員每每以積極不干預來作推搪的利器，但在上文筆者已表明，積極不干預只是政府的不作為的一個託詞，現在環球競爭日重，單靠業界的努力已不足夠，政府的政策配合更是需要的。筆者不是說要政府介入商業運作，而是每每以積極不干預當作不作為的代名詞，卻是誤解了積極不干預的意義，積極不干預不代表什麼都不做，而是政府政策要配合經濟發展，所以我們在重視市場力量的同時，不代表政府有為即干預市場，積極不干預應是順應社會發展，而不是抱殘守缺的要政府不作為。

規劃並非洪水猛獸

新的一屆特區政府會在七月上任，候任特首在多個範疇已表明會有新的政策，但同時間也招來了破壞積極不干預的疑慮。正如筆者上文所說，適當的政策配合，其實是經濟發展的催化劑。現時六大產業發展似有若無，缺乏的就是政府的投入和幫助，加上產業缺乏政策支援，各個政策局之間的政策又往往不協調，業界的努力久久未見成效，假如政府在積極不干預的政策導向上，對「積極」和「不干預」作出平衡，明白「積極」不是等於計劃經濟，「積極」並不代表粗暴的干預經濟活動，執行政策上也不是一面倒向「不干預」傾斜，有一點規劃並不是洪水猛獸，政府適度的作為，將會令香港的經濟發展更順暢。

作者為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